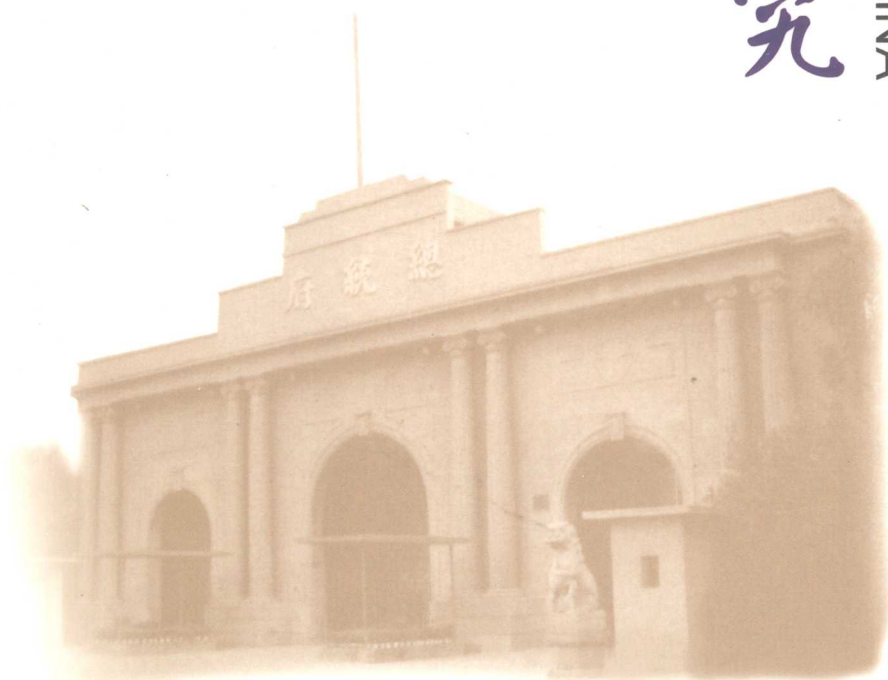


CSSCI来源集刊
总第15辑
2009年春季号

民国研究

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CSSCI 来源集刊

民国研究

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

总第 15 辑

主编 / 张宪文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民国研究 (总第 15 辑)

主 编 / 张宪文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总 编 辑 / 邹东涛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sap.com.cn>

网站支持 / (010) 59367077

责任部门 /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(010) 59367215

电子信箱 / bianjibu@ssap.cn

项目经理 / 宋月华

责任编辑 / 徐思彦

责任校对 / 张德玉

责任印制 / 岳 阳 郭 妍

总 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

(010) 59367080 59367097

经 销 / 各地书店

读者服务 / 市场部 (010) 59367028

排 版 /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15

字 数 / 263 千字

版 次 /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0889 - 7

定 价 / 39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
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民国研究》编辑委员会名单

中国内地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振犊 张宪文 张 磊 李文海
李 玉 汪朝光 陈红民 陈谦平
茅家琦 金普森 姜义华 徐思彦
崔之清 章开沅 谢俊美

港台地区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张玉法 梁元生

国 外（以中文笔画为序）

久保亨〔日本〕
方德万（Han J. van de Ven）〔英国〕
罗梅君（M. Leutner）〔德国〕
柯伟林（W. C. Kirby）〔美国〕
高念甫（Andrei N. Karneer）〔俄国〕
萨马拉尼（Guido Samarani）〔意大利〕
裴京汉〔韩国〕

主 编 张宪文

执行编委 陈谦平 李 玉 徐思彦

目 录

民国社会研究

“吃茶与国运”

——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政治与茶馆政治文化 …… 王 笛 / 1

“俯顺舆情”重于“消除迷信”

——1936 ~ 1937 年四川旱灾中政府对拜神祈雨的态度

…………… 曹成建 / 24

民国宗教研究

福音与社会的契合：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

劳工问题为例 …… 赵晓阳 / 38

基督教与民国时期的乡村识字运动 …… 刘家峰 / 51

民国经济研究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GDP 下降之影响因素研究 …… 刘 巍 / 70

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上海铜元危机及其应对

——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讨论中心 …… 彭南生 / 80

富华贸易公司始末 …… 郑会欣 / 97

“有限内迁”与经营扩张

——战时大后方的刘鸿生企业（1937 ~ 1945） …… 蒋宝麟 / 117

民国城市研究

南京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及其特点（1865 ~ 1937） …… 侯风云 / 137

“弘我汉京”：民族主义与国民政府的现代都市认知

——以 1927 ~ 1937 年国民政府的首都观为例 董 佳 / 151

日伪物资统制下南京商人的生存策略 张福运 / 162

专 论

民国初年“救国储金运动”概论 贺俊杰 / 174

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组织变迁论略 任云兰 / 186

研究综述

2008 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 孙 扬 / 201

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姜良芹 / 220

史料视窗

一个消失县份的珍贵乡土史料

——民国时期《西康省义敦县乡土教材》及其

历史文化价值 王 川 / 223

稿 约 / 232

“吃茶与国运”

——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政治与茶馆政治文化

王 笛*

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是一个政治舞台，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。^①在晚清民国时期，国家日益增强对公共生活的干预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城市的公共场所，并对其进行严密管理。茶馆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，成为城市改良的主要目标。政府发布了许多关于茶馆的法规，这些法规的制定都是基于茶馆、茶馆生活、茶馆娱乐对社会有害这样一个观念之上。虽然政府无法将这个无数人赖以谋生的行业消灭，但对茶馆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。任何茶馆如果违背法规，都会受到严厉惩罚，甚至被政府关闭。当局还竭力把国家意识灌输到公共生活之中，把大众文化引导到政治轨道。政府控制也影响到国家与社会、精英与民众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关系。在抗战时期，民族危机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好机会，使其能够把触角深入到茶馆这个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间。一方面国家运用话语霸权把“吃茶”与“国运”（国家之命运）对立起来，但另一方面又力图把茶馆改造成为政治宣传之工具。^②

本文讨论茶馆如何成为一个政治舞台，如何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文

*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、美国得克萨斯 A&M 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① 关于中西方文献中茶馆研究状况，请参见拙文《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——以成都为例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第5期；Di Wang, “The Idle and the Busy: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-Century Chengdu,” *Journal of Urban History* 26.4 (2000): 411–437。这里不再重复。

② 茶馆也是一个社会冲突的舞台，我在关于街头文化的研究中讨论了这个问题（Di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: Public Space, Urban Commoners, 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, 1870–1930*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, chap. 6）。江南地区关于茶馆冲突的研究，见 Qin Shao, “Tempest over Teapots: 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,”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57.4 (1998): 1021–1030。

化,揭示民众、精英以及国家如何利用茶馆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。我们可以看到,国家政权在茶馆这个微观世界里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。这种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愈渐加强的控制,反映了全国以及四川省和成都城市政治的演变。本文还将研究公共空间、休闲娱乐活动如何与政治联系在一起,如何与经济状况恶化、社会秩序混乱、政治运动蜂起等因素密切相关,探索各种政治势力在茶馆中的角逐。本文还揭示,虽然茶馆竭力远离政治,但经常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和茶馆的顾客拖入政治旋涡之中。国家试图打击任何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意识和活动,压制人们的政治言论,但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形式的反抗。

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,几乎经历了从晚清改良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变迁的全部过程。我把这些变化在四川和成都的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,每个时期各具特点,并对茶馆和茶馆政治发生了不同的影响。在20世纪上半叶,虽然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冲击,但仍然保留着其独特性。^①传统成都社会生活是由地方精英来组织的,然而在1902年警察出现后,这种控制模式开始变化。^②1910年,成华议事会成立,其成员通过选举认定,成为当时自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警察和议事会尔后都成为建立成都市政机构的基础,警察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。清廷的倾覆没有给成都城市管理带来根本性变化,不过是更剧烈的动乱而已。1913年,根据中央政府指示,组成新市议会负责城市公共事务。1922年,作为全国范围内成立市政府的一部分,省府批准成立成都市政公所,1928年改组为成都市政府,成都第一次出现了市政管理的专门机构。从20年代到40年代,市议会与市政府共存。1949年12月,共产党政府成立,成都市政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管理系统。^③这些行政机构的演变,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茶馆的发展、管理以及文化。

①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说法:“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已治蜀未治。”其强调了四川的特别及其在国家政治中的战略地位,也显示了治理四川的困难。自19世纪以来,四川一直是中国的第一人口大省。

② Di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. 2.

③ 关于成都城市管理的演变,见 Kristin Stapleton, *Civilizing Chengdu: Chinese Urban Reform, 1875-1937*, Cambridge: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0; 王笛:《跨出封闭的世界: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,1644~1911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401~402页;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s. 2, 4, 5; 乔曾希、李参化、白兆渝:《成都市政沿革概述》,《成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5辑,1983年,第1~22页; 何一民主编《变革与发展: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2,第3章。

由于茶馆面向公众，许多冲突和难以预料的事件都可能在那里发生。另外，茶馆作为成都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，经常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。因此，地方政府十分关心茶馆里的秩序并试图加以控制。为达此目的，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规章，其中制定于辛亥革命之前的4个，民初3个，20年代1个，30年代2个，抗战时期4个，1948年4个，仅目前我所掌握者便有15个之多。^① 这些规章涉及茶馆的各个方面，包括登记注册、禁止赌博、控制帮会、演出娱乐、营业时间、警察监督等。其中一些包罗万象，也有一些仅针对某一方面。在这15个规章中，9个为综合性的，2个涉及公共卫生，3个关于茶馆戏园和表演，1个规定茶馆数量和营业时间的限制。虽然这些规章发布的时期不同，但从对茶馆的政策看，并无大的差异，表明了地方政府对茶馆控制政策的持续性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看到在40年代末，政府明显加强了对茶馆的进一步压制。

一 从改良到革命（1900～1916）： 重新打造茶馆

在清政府倡导、地方政府推动、地方精英积极参与的新政运动中，20世纪的最初10年出现了一个城市改良的热潮，城市成为工商业、教育以及社会改良的中心。在这一时期，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，积极参与改良，扩展他们对民众的影响，确立他们的社会声望。^② 这些活动显示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态度，以及国家对待茶馆生活的一贯政策。在从晚清以来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，茶馆经常作为表现“惰性”或

① 《四川通省警察章程》，1903年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巡警部档案：1501-179；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：93-6-2718（本文中档案注释，凡两组数字者，依次为全宗号、案卷号；凡三组数字者，依次为全宗号、目录号、案卷号）；《国民公报》1916年12月16、26日；《成都市市政年鉴》，1927年，第510-512页；《成都快报》1932年4月2日；《新新新闻》1945年3月16日；贾大泉、陈一石：《四川茶业史》，巴蜀书社，1988，第369页；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商会档案（民国）：104-1388、1406；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（民国）：38-11-298；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（民国）：186-1431；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：93-2-2559。那些涉及各服务行业并非专门针对茶馆的、或没有实行的规章不包括在内。可以认为实际有关茶馆的规章应该比这里所讨论的要多。

② 关于成都城市改良的更详细的讨论，见 Stapleton, *Civilizing Chengdu*;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s. 4, 5.

“落后”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评。^① 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献中，茶馆总是被指责为各种社会弊病的萌生地，诸如糟糕的卫生条件、散布流言飞语、赌博、下流表演，不一而足。因此，茶馆不断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，他们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馆进行严格控制，作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并对社会全方位操纵的重要一步。虽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馆的积极因素，承认茶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角色，但许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政府观念，对茶馆持否定态度，为国家限制、控制、攻击茶馆文化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。这些措施有的缓和，有的严峻，视当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状况和趋势而定。

在反大众文化的大趋势下，成都警察局成立伊始，便在1903年制定了《茶馆规则》，作为城市改良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反映了政府从一开始便对茶馆问题十分重视。规则要求所有茶馆必须向警察登记，不得设赌、斗雀，不允许秘密会社摆码头；说书人应向警察禀告，不得“演说淫邪妄诞之事”，违反者“则逐之”；茶馆桌椅不得太密，不得放在檐外，以“侵占官街”；如果有人利用茶馆“评论是非”，则应立即报告警察；各茶馆必须在二更（即晚11点）打烊，警察可随时进入茶馆盘查，但不得饮茶，“有强买者可扭禀总局，私卖者同罚”；任何茶馆违反规则者，轻则罚款，重则勒令关门停业。^② 警察总是对茶馆和茶客密切注意。如清末颁发的《省垣警区章程》中的“了望巡回通守之细则”中，便把茶馆作为“最宜留心”的对象之一。如果有半夜1点还未熄灯的茶馆，警察将“极宜加意注意”。^③ 不过晚清对营业时间之限制不像以后那么严格，而民国年间有若干时期都要求茶馆必须在晚上9点关门。

1911~1916年间，作为革命之中心地带，成都经历了剧烈政治动荡。许多民众加入保路运动，反对铁路国有。1911年12月，四川宣布独立，成立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。^④ 1913年，都督尹昌衡被袁世凯的亲信胡景伊

① 邵勤讨论了南通改良精英认为茶馆是“落后”的，因此必须改造。我自己的研究则分析成都茶馆如何成为城市改良的目标。见 Qin Shao, “Tempest over Teapots”; Di Wang, “The Idle and the Busy: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-Century Chengdu,” *Journal of Urban History* 26.4 (2000): 411–437;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. 5.

② 《四川通省警察章程》，1903年。

③ 《省垣警区章程》，《四川警务章程》卷2，第27、30页。原件无日期，根据内容判断应是晚清制定的。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东亚图书馆。

④ 关于这个运动见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. 7。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和罗纶等与护督赵尔丰谈判，达成协议，蒲被推为都督。但1911年12月清兵骚乱、抢劫藩库和成都商业区，蒲和其他新政府官员逃之夭夭。在骚乱被平定后，赵被尹昌衡为首的新军和革命党人处死。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成立，尹为都督。见隗瀛涛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1，第3、5章；Stapleton, *Civilizing Chengdu*, chaps. 3, 5;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chaps. 5, 7。

所取代。同年，一些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，但运动很快失败。1915年和1916年间，四川成为护国战争的主战场，虽然这场反袁运动以胜利结束，但滇军和黔军的进入却对四川贻害无穷。^①

茶馆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，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。在那里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，精英传播其改良思想，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，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。茶馆本身也难免经常卷入政治活动，如反对增税、抗议对茶馆的限制、参加各种慈善救灾等。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，茶馆更成为政治中心，每天人们聚集在那里，议论运动的最新进展。正如李劫人所描述的：人们“都一样兴高采烈地蹲在茶铺的板凳上，大声武气说：‘……他妈的，这一晌他们做官的人也歪透了，也把我们压制狠了！……’”韩素音在所撰的家史中写道：1911年5月底“是不安的、焦急的、渴望的，在公园的茶馆里和在街头，充满着躁动。一个不安的城市，正面临着骚乱。”茶馆不再只是人们闲聊的地方，而且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，“‘来碗茶’的吆喝，即是激动人心演讲的开始，吸引了三教九流。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，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，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。这场散了，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。”^②

一些茶馆抓住时机，参加更多的公益事务，以提高其社会声誉。例如，它们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赈灾活动。1909年可园邀请若干著名演员演戏，将两天的收入捐给甘肃赈灾。次年，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，每票1元，1400多人购票看戏。1912年，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“国民捐”，并动员人们踊跃购票。虽然茶馆以慈善活动来为其演出做宣传、提高知名度并招徕生意，但这些活动也使它们同国家和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。^③

①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pp. 228 - 230; Stapleton, *Civilizing Chengdu*, chap. 7; Robert A. Kapp, *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: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, 1911 - 1938*,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73, chaps. 1, 2.

② 李劫人：《大波》，《李劫人选集》第2卷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0，第788页；Han Suyin, *The Crippled Tree: China, Biography, History, Autobiography*, New York: G. P. Putnam's Sons, 1965, pp. 228 - 229.

③ 《通俗日报》1909年8月6日、1910年5月25日；《国民公报》1912年6月14日。这类活动在以后军阀时期也可以经常看到，如茶馆也经常被用作政治庆祝活动，如1929年10月，一一茶园雇成都最好的木偶戏班，以庆祝双十节。（《国民公报》1927年10月7日）在抗战时期则更为普遍（详后）。事实上，茶馆不断改进其服务以适应顾客需要，如绿茶社提供书、报纸、以及留声机。（《国民公报》1918年5月8日）在1930年代，顾客可以花几分钱租报纸，看完后还可以与别人交换。见何满子《五杂俎》，成都出版社，1994，第194页。

二 军阀统治（1917～1936）：见证政治动乱

从1917～1936年，成都经历了战争、破坏、重建、战争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。在这一时期，省政府几乎所有要职都被军阀占据，他们互相争权夺位。成都自然成为各种军事势力的控制对象。1917年成都市民经历了一场噩梦，先是川军与滇军之间巷战，后是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夺城之役。许多无辜市民死伤，一大部分城市被毁，无数民居被夷为平地，成千上万人沦为难民。^①巷战期间，受惊的居民藏匿在家，店铺关门，百业停顿，但茶馆总是最后关门最先开门之地。吴虞在日记中写道，“闻街上茶铺已开，渐有人行，乃出门访傅朋九”，而是日“各街铺户仍未开也”。因此，从一定程度来说，成都居民视茶馆的开闭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某种标志。在动荡时期，警察以茶馆有奸细搜集情报或散布谣言、容易引发动乱为由，令各茶馆一旦发现外省口音者议论军情、或者其言行看起来像“敌人侦探”者，必须立即报告。如果嫌疑犯被确认是奸细，告密人将得到10个银圆的奖赏。^②实际上，警察经常以所谓“奸细”的罪名，来压制任何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。

1921年，四川省在急剧发展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宣布独立。到1926年，在“川人治川”的口号下，四川军阀方得以驱逐滇黔军出川。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省长，他立即对成都实施大规模城市改造，开辟新商业区，拓宽道路，极大改变了城市面貌。^③1928～1936年间，虽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国民党的管辖之下，但四川实际上仍处于自治状态，为军阀势力所控制。1928年成都市政府建立。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几乎无法控制四川，在所谓的“防区制”下，五个最有势力的军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^④1932年和

① 《国民公报》1917年5月5日、7月29日。

② 《国民公报》1916年7月1日、1917年8月20日；吴虞：《吴虞日记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4，第265～266页。

③ Wang, *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*, pp. 228 - 230; Stapleton, *Civilizing Chengdu*, chap. 7; Kapp, *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*, chaps. 1, 2.

④ 这五个军阀是刘湘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颂尧、杨森。这一时期，成都前后也有五任市长，都是这些军阀下属将军。这时期的四川被认为是中国最混乱的地区，但实际上在这个权力结构下，这几年的成都还相对地安定。（Kapp, *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*, chap. 3）但1932年，刘湘和刘文辉之间开战，次年又是邓锡侯与刘湘间战争，都以成都街头为战场，造成自1917年以来的又一场大灾难。这些军阀疯狂征税，走私鸦片，控制经济。沉重的赋税负担，经济的不稳定，再加上土匪横行，使许多人变卖了田产而到成都居住，从而为成都茶馆带来新的客源。

1933年，红军进入四川，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军阀遂把矛头指向共产党，被迫向蒋介石寻求支持。直至1935~1937年间，中央政府才终于将其控制力扩展到了四川。^①

这个时期变化莫测的政治在茶馆生活中清晰表现出来，特别是从人们在茶馆的日常交谈中。虽然人们总是在茶馆里谈论各种话题，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，因为对人们的这一日常行为，几乎没有多少东西记录下来。不过，仍然有一些人描绘了他们在茶馆的所见所闻。有些话题虽然看起来与政治没有直接联系，却暗含着对时政的批评。下面是1917年某日两人在茶馆的对话：

甲乙二人于茶社闲谈。甲曰：“中国数千年以来，皆尚贞洁。朝廷特为贞洁表扬，故贞洁坊无处不有。自民国以后，置贞洁于不顾，此于风俗人心实多妨害。”乙曰：“非也。吾国以前尚节，今则重籍。如民国元二年间，各印刷公司所印之名片无非四川籍。三年时，所印之名片无非外省籍。五年共和再造后，所印者不多四川籍？今更改印外省籍矣！然则士大夫所尚者，岂非籍耶？不过字不同耳。”甲曰：“一人之籍，迭次变更，则非真籍可知。诚如君言，则今日之士大夫，其有真籍者乎？不真之人，吾国数千年所不取者也。”^②

这里表面上讨论的是籍贯问题，但言下之意是批评政客的势利和虚伪。民国初年，川人在政治舞台的角色经常变化。当川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得势时，人们争相宣称自己是四川人；失势时，则又非川人了。批评者认为这是道德沦丧之表现，人们不再看重“贞洁”。在传统中国社会，妇女不守贞被认为是“堕落”；但在这个对谈中，政客被认为“失贞”，是因为他们成了无耻的说谎者。^③

① Kapp, *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*, chaps. 3, 4, 5; 乔曾希、李参化、白兆渝：《成都市政沿革概述》，《成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5辑，1983年，第15页；张学君、张莉红：《成都城市史》，成都出版社，1993，第296页；何一民主编《变革与发展：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》，第345~346页。

② 《国民公报》1917年4月9日。

③ 地方报纸还记录了另一个茶馆谈话：“某茶园有三四个人吃茶。甲曰：‘我昨日看报，见《报纸法》宣布矣。’乙曰：‘这一下就好了。’丙曰：‘《报纸法》宣布是钳制舆论，有那[哪]些好处？’乙曰：‘《炮子法》宣布，他们二天就不乱打，免得胡胡[糊糊]涂涂死些人，岂不好吗？’甲曰：‘我在说报子，你就扯到炮子上去了。’乙曰：‘省城这回只有炮子厉害，振[整]得人莫法，我听你说《炮子法》宣布，所以不禁叫好。’（转下页注）

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，即看到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，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。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，实际上涉及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的各个方面，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。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，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。在清廷覆没之后，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。不过，籍贯问题虽然依然重要，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，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，而是把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。这个在茶馆中关于籍贯的谈话，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。

人们在茶馆中不仅就生活琐事闲聊，打听小道消息，或飞短流长，从报纸上偶尔透露的信息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茶客在茶馆里抱怨生活的艰辛，对政客争权夺利、政治腐败、国家动乱的愤怒，还有对局势的担忧。这是两个老人1922年某天在茶馆的对话：

有两个老者，在茶园坐谈。甲呼乙曰：“亲家，你见到没有？近来世界新、潮流新、学说新、名词新，我们不会跟倒新。又有笑无旧可守，只好听他罢！”乙曰：“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，足以迷人睛，炫人目，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。稍明事体的，都知道是壳子话，骗人术，你这么大的岁数，还不了然吗？辛亥年耳内的幸福，到而今你享足没有？还有不上粮的主张，你记得不，如今却不去上粮，预征几年就是了。又有种种的自由，你乡下大屋不住，搬到省来，就不敢回去，究竟自由不？热闹话我听伤了，如今再说得莲花现，我都不听。”^①

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对话的背景。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期间，新思想、新文化流行，西化和保守的精英也针锋相对。对话中的两个老人，可能属于厌新的旧守派。从这段对话，我们发现他们反对“新”是由于他们的经历，因为“新”仅仅是许诺，并没有兑现。辛亥革命后的动乱和艰辛，使他们倍感失望，革命的许诺没有成为现实，而且日益缺乏安全感。人们生活的世界更危险，更缺乏自由，赋税负担更重。因此，人们难免不

（接上页注③）大家为之一笑”。（《国民公报》1917年5月10日）这样的谈话固然会使人忍俊不禁，但也暴露了人们的无可奈何。茶馆里这种误解经常可见，特别是关于政治问题时。“报纸”与“炮子”的四川话发音非常相近，从表面看，这是对近音词的混淆，但实际揭示了人们对政治的看法。对甲来说，《报纸法》违反了言论自由，使媒体成了思想控制工具；对乙来讲，更严重的是生命保障问题，军阀的武装造成了社会动乱和日常生活缺乏安全感。

① 《国民公报》1922年2月10日。

把账算到“新”的头上。他们一方面抵制“新”，但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所依恃的“旧”（传统）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正摧枯拉朽般地改变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。尽管出于弱势一方，他们则表达了对崇新者的不屑，强调自己的社会经验。这倒很类似鲁迅小说《阿Q正传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。^①

军阀政府力图对茶馆进行控制，发布了若干关于茶馆戏园及其表演的规章。1932年制定关于茶馆的综合条例，成都市府发布5条茶馆管理办法，特别强调了卫生和赌博问题。1935年，地方政府以“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”制定规章，只允许每个公园开一个茶馆；茶馆密集地方，酌情取缔；茶馆只能在早晚营业共6个小时。^②这些新规章反映了政府激进的、日益增长的对茶馆及其茶馆文化的关注和采取的政策。不过没有资料证实这些新规定得到了认真的实施，否则大量从业者将失去生计。茶馆的营业时间也并未大幅度缩短，一般仍然有十五六个小时。另外，成都茶馆的数量在1936年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从599增加到640个。^③这个规章未能得到很好实施说明了地方习惯和茶馆文化的坚韧，其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能够抵制国家的管控。

三 战时日常生活的政治（1937~1945）： “吃茶与国运”

抗日战争将茶馆政治和茶馆政治文化推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对成都亦有着深刻影响，川省与中央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^④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、社会和文化组织、学校、工厂等迁移成都，大量移民涌入这个城市，随之也引进了新的文化因素。^⑤抗战把政治也带入到茶

① 鲁迅：《阿Q正传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73，第359~416页。

② 《成都快报》1932年4月2日；贾大泉、陈一石：《四川茶业史》，巴蜀书社，1988，第369页。

③ 《警务旬刊》1936年第3期。

④ 为了直接控制川省，蒋介石本人兼任四川省长，我在档案中看到一些关于茶馆的文献甚至由“蒋中正”亲自签署。

⑤ 1940年，成都遭受严重的粮食短缺，并造成米骚乱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并躲避日本的飞机轰炸，政府令市民疏散到郊区。人们生活在战争阴影下，1938~1941年，“跑警报”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1941年和1942年间，由于日本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，停止了轰炸，人们才陆续回到城内。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，共有13次轰炸，但损失最严重者为1939年6月11日、1940年10月27日、1941年7月27日，几千人伤亡，无数人无家可归，许多街区沦为瓦砾场。见刘西源《跑警报》，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《成都掌故》第2辑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8，第148~151页。

馆之中，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，在那里贴标语、海报、告示，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。茶馆实际成为一个“救国”的舞台。茶馆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，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。人们就英勇的抵抗、日军的残暴、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。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馆里去度时光，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，但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，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。

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，周文描述了他30年代末到成都的所见所闻。当时救亡运动达到了高潮，他看到学生在茶馆里举着旗子，站在椅子上充满激情地演讲，顾客认真聆听。然而周也很快发现，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。在到成都几天之后，他便看到有人敲着鼓穿过大街，为演出做广告，而各戏园仍然爆满。周并非是唯一看到这个现象的人，一篇题为《显微镜下之成都市》的文章，批评成都市民在民族危亡、与日寇浴血奋战之时，仍然在茶馆和戏园悠闲地消磨时光。文章指责成都是一个“光怪陆离的社会”。在这个时期，国家力图规范战时生活，从而引起了关于“吃茶与国运”的讨论，把坐茶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，这样光顾茶馆便被定义为不爱国、不关心国家命运。^①“吃茶”与“国运”本来并不相干的两回事，便如此地在国家的话语霸权下被连接起来。然而，茶馆中的悠闲不过是成都社会的表面，实际上战争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虽然人们仍到茶馆戏园看戏，但所看节目与以前已大不相同。犹如《新成都》的编撰者所说：“过去成都说评书者，他们用的词本，大都词令秽褻，情节荒诞，徒知一时兴奋，无形中腐化了无数民众思想和行为”。但抗战爆发后，“虽采的书本仍系不外旧的词本，但中间加添些与抗战有关激起人民爱国思潮的话语，虽属娱乐，对国家社会，影响殊大。”^②

1941年，一篇文章谴责所谓“成都现象”，即像春熙路、总府街等热闹地区，有十余所茶馆之多，且从早到晚顾客盈门。作者批评一些“白相

① 《新民报晚刊》1943年10月27日。

② 周文：《成都的印象》，见曾智中、尤德彦编《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》，“老成都系列”之一，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9，第229页；《新新新闻》1938年4月9日；周止颖：《新成都》，复兴书局，1943，第224页。在抗战初期，茶馆经常参与爱国活动，特别是募捐活动。例如9月1日是“记者节”，春熙舞台开始演出三天京戏和川戏，称之为“记者游艺献金大会”，许多著名演员应邀演出。这个活动受到一些著名戏班响应，名角也积极参与，“名票名角会串，珠联璧合”，上演他们的“拿手剧目”。据称节目都是宣扬“忠勇爱国意识”。据报道，人们购票踊跃，反映了他们的“爱国热忱”。见《成都快报》1938年8月25、27日。

的人”，坐在茶馆里无所事事，他发现“成都茶馆变成了很不平凡的场合，女茶房与茶客公开打情骂俏，有特别的房间小费，有时甚至超过茶资四五倍”。另一篇文章也指责，当物价飞涨之时，娱乐业则生意兴隆。当战时人们应该节约之时，则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消遣上。^① 1942年，一篇题为《闲话蓉城》的文章指出，从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看，好像国家并非在战时，到处是装饰华丽的商店、拥挤的娱乐场所、熙熙攘攘的茶馆。人口的增加使这些服务业“如雨后春笋”，难以想象这时国家正在危机中挣扎。另一篇文章更借用蒋介石的话称：“假使坐茶馆的人，把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，则中国革命早就成功了。”蒋介石是否说过这样的话，已无从可考，但这种把吃茶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批评，既是时髦，亦代表了政府和改良精英对茶馆的一贯态度。许多精英认为茶馆反映了人们的“惰性”，在茶馆中消磨时光，浪费生命。《新成都》一书描述人们在茶馆中“谈古论今，议论社会，下棋赌赛，议评人物，刺探隐私，妄谈闺阁”。作者不禁问道：“天下竟有如许闲人，化[花]了金钱，来干此闲事”。^② 实际上茶馆具有多功能，这些批评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只看到人们的休闲，认为这是与爱国背道而驰的，却忽视茶馆对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的其他作用。

其实，当政府竭力控制大众娱乐、试图改变战时人们的观念之时，也寻求用茶馆来进行战时教育，如在精英参与下改造评书，提供新书报，在墙上贴宣传图片和标语，提倡新娱乐等。战争爆发后，虽然旧戏曲仍可上演，政府要求必须包括爱国和抗日内容，^③ 还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，负责审查剧本。部分被审剧本目前还可从档案中看到，提供了政治如何影响大众娱乐的第一手资料。我所看到的12个剧本，全部与抗日有关。一些回顾日本侵华历史，一些赞扬抗日运动，一些歌颂战场上牺牲的英雄，一些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，一些历数日本军队在华犯下的暴行，一些哀叹国家的不幸，等等。这些演出形式多样，其内容和语言对唤醒和动员民众，都有着强烈的感染力。^④

① 《华西晚报》1941年6月16日、11月23日。

② 健夫：《闲话蓉城》，《华西晚报》1942年6月17日；秋池：《成都的茶馆》，《新新新闻》1942年8月7、8日；周止颖：《新成都》，第246页。

③ 王庆源：《成都平原乡村茶馆》，《风土什》第1卷第4期，1944年，第37~38页；周止颖：《新成都》，第224页。

④ 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：38-11-1103。这些剧本的题目包括《还我河山》、《汉奸题名》、《汉奸的下场》、《倭寇侵华图》、《抗日调》、《故乡曲》、《吊姚营长》、《国情恨》、《五更叹国情》、《英勇抗日》、《阎锡山枪决李服膺》、《新四川》等。见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：38-11-1103。